

山中银杏各不同 暖阳之下景色新



记者 唐正飞



与鼯鼠相处的日子里

龚光斌

父亲的坟就在村后山坡上，坡边有一长排二层楼的白墙灰瓦房子。

首先，这里只住了两户人家。

那时候，村一律被称为生产队，我们队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强胜大队。

20世纪70年代初，强胜大队的一个劳动日（一个一等劳力一天的劳动所得，通常被折算十分工）就能折合成1.5元钱了。这可是远近闻名的，令人羡慕不已。

1976年秋收后，父亲就组织村里的青壮劳力在后山边上的乱石堆中，盖起来了6间两层楼的土墙房。是他们一担一担挑着倒进墙坯，全凭双手用墙杵一点一点夯起来的。那些瓦匹、檩子、椽子无不浸透着他们辛勤的汗水！

一个冬，6间房子就盖起了。它是队里的第一批楼房。它有着宽大的玻璃窗，照得屋里亮堂堂的。

那6间房子被分配给了全队人口最多，劳力最多，住房最紧张的2户人家居住。一户3间，因为两层楼，实际上是6间，再加上屋后的厨房和厕所，就略等于8间了。所以乡亲们都说那两家的房子叫“明三暗八”的新房大瓦屋！

赶在过年前，那两户人家喜迁新居，从此日子越过越红火，上门提亲说媒的人络绎不绝，不晓得惹了儿多人羡慕。

当时我二哥也参加了建房，他就问父亲咋不给自己家也盖几间两层楼？我父亲的回答：“有本事，到时候你自己盖3间大瓦屋给老子看看！人家十几个人挤在土改分下来的2间老房子里，不先尽着他们，这还是啥话？”

后来，父亲又紧接着那2间半房子盖了3间土墙瓦屋。换大家伙的工，好多才一一还清，所以他说得起硬话。

1950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起就担任队里的支部书记。最初全大队只有六十多人家，人户集中居住在方圆两三里。农田紧缺，主要靠开垦荒地，种植玉米洋芋为主。

清凌凌的金沙河水从蜡烛山流出，出了山口，它有了新的名称——石牛河。石牛河从王家院子流过，一路流经坝河、黄洋河，汇入汉江。

1953年，父亲就力排众议，坚持带领社员群众修了两条渠。一条渠从蜡烛

如果说夏宜拼搏，冬天则合适团聚。在空调，暖气尚未走进千家万户前，围炉取暖，是人们最惬意、最适合的过冬方式。如果遇到冬日暖阳，炉火便要黯然失色，人们纷纷走出户门，贪婪地吸收着阳光带来的温暖。或入园打理着越冬的蔬菜，或晾晒着秋收回来的玉米黄豆，抑或是围个圈聊着天。

夏日亲水狂欢，冬天乐山晒暖。冬日阳光诱惑着蜗居于城市的人们，收拾行装，打包心情，去周边的山区，找一处背风向阳处，看落叶飘零，冬苗破土。

初冬时节，城东余家山千年银杏树下，一地金黄的银杏叶间，留下一串串脚印，印证着此前满树“黄金叶”，引来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历尽沧桑，这棵当地村民口中的千年银杏树与周边一些小银杏树有了明显区别，千年银杏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而其他银杏树则是一身“黄金甲”屹立于山坡上。当一阵风吹过，千

银杏纹丝不动，而年轻的银杏树伴随着哗啦啦的声响摇曳着身子。也许是树大招风，吹落了年迈银杏树的叶子；也许是年轻银杏树“火气”大，留住了满身黄叶；抑或是年迈的银杏树，将“营养”留给了住在这里的人和来此“看望”它的游客；正如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项机能都有所减退吧！

因为这棵银杏树，来余家山的人也多了起来。有背着画架来此写生的师生，有来此采风的文化墨客，更多的是携家人约好友的游客。

从小围着银杏树长大的余成兵，趁着冬日暖阳和老伴儿、邻居一起剥着玉米。热情地招呼着经过门前的游客，如游客有兴趣，他还会免费当起讲解员，讲述这个千年银杏的故事。偶有游客饥肠辘辘，自己和老伴儿也会拿出山里人的厚道热情招待，只是谁也不愿让两位留守农村的老人吃亏。

下乡采访也经常遇到一些尴尬事。1974年春天，为了解春耕生产和群众生活，我到汉阴县北山一个公社采访。陪同的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徐秀凤是位年轻姑娘，采访对象是这个公社的副书记，也是一位年轻姑娘。

采访结束后，她邀请我们在她家吃饭，她家当时只有母亲在，我记得吃的是新胡豆拌汤。她家有一条大狗，我们去时它不张声，吃饭时它趴在灶台边，等我吃完放碗时，狗猛一下朝我屁股狠咬一口，立马掉头便跑。当时我一是吓一大跳，二是屁股烧疼，两位姑娘和一位农村大妈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缓过神来，我问公社书记有没有镜子，她拿出一面来，我钻进房子，关上门，脱下裤子，用镜子艰难查看。好的是，春天乍暖还寒，下乡时穿得厚，四个狗牙印清晰可见，倒是没有流出点滴鲜血。三位女同胞让我好好休息会，压压惊，晚一点再出发回县城。从此我怕狗，也因为我属狗，几十年一贯是这样。

李胜金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

下乡采访有时会碰到关庙的老乡。1973年夏天，报社派我和女同事赵振清去镇坪采访，任务是采访镇坪县大力发展中药材。我们俩都年轻，未婚，赵振清西安师范学院毕业来安康锻炼，分在安康日报社当记者。她是典型的关中西子，人高马大，口畅心直，很有文采，大城市的姑娘第一次到镇坪，既新奇，更多的是不适应。那时在镇坪，一条街，吸一根烟便从上街走到下街，两边的高山好像压在人头顶，令人喘不过气来。一到黄昏，街上便少有行人，昏暗的路灯下一群无名的虫子乱窜，赵振清此时的心情也是这样的。采写之余，她经常拉我上街转，有时热情的很，说实话，我不想随她上街转悠，人家大城市的人很开放，我们山沟沟的比较封建。那时镇坪县招待所吃的是“面面”饭，即用玉米糝蒸成干饭，全是散的，很难下咽，我们都是吃一口面面饭，喝一口水，冲下去。我们的工作很顺利，采写任务不到一周便完成了。赵振清说：“赶快回，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可是越急越有事，那天上午坐班车回安康，车还没到曾家坝公社，便遇见大塌方，无法通行。所有旅客必须在曾家坝旅馆住一夜，等待清理塌方。当时我还去报社同事任玉荣挑了一副木桶，一群人争先恐后奔向旅店。几公里路下来，我和赵振清在最后一间房，等我们去登记住宿，店说：“只有一间了，你们两小口刚好。”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们不是两口子，我们是同事。”赵振清在边上傻笑。最后赵振清住那唯一一间房子，晚上我住在登记室，将就一夜。回到单位后，大家都知道镇坪之行我们被误解，一时成为笑谈，赵振清后来调回西安，嫁给著名导演吴天民的弟弟为妻，不久前听人传说，赵振清同志去世了，真是惋惜，好人哪，大城市的姑娘在安康受苦了。

下乡采访也经常遇到一些尴尬事。1974年春天，为了解春耕生产和群众生活，我到汉阴县北山一个公社采访。陪同的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徐秀凤是位年轻姑娘，采访对象是这个公社的副书记，也是一位年轻姑娘。

采访结束后，她邀请我们在她家吃饭，她家当时只有母亲在，我记得吃的是新胡豆拌汤。她家有一条大狗，我们去时它不张声，吃饭时它趴在灶台边，等我吃完放碗时，狗猛一下朝我屁股狠咬一口，立马掉头便跑。当时我一是吓一大跳，二是屁股烧疼，两位姑娘和一位农村大妈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缓过神来，我问公社书记有没有镜子，她拿出一面来，我钻进房子，关上门，脱下裤子，用镜子艰难查看。好的是，春天乍暖还寒，下乡时穿得厚，四个狗牙印清晰可见，倒是没有流出点滴鲜血。三位女同胞让我好好休息会，压压惊，晚一点再出发回县城。从此我怕狗，也因为我属狗，几十年一贯是这样。

下乡采访也经常碰到惊喜。1971年秋，商洛镇安到旬阳的公路通车，报社派我去采访。当时去旬阳没有公路，必须绕道汉阴、石泉、宁陕、柞水再到镇安县，地区领导是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博林，他去剪彩，军分区派一辆212军车，去镇安县，同行的除了司令员外，还有交通局等单位的干部。212车刚过大桥，便坏掉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然后一车人都下来转转，等车修好了再走，我年轻，跑过去帮司机递工具啥的，司机满手油，脸上也涂上了，我替他擦脸，他一望我，随口问，你在关庙中学上过学没有，我说了上，他立马认出我说：“你是我们632班班长李胜金？”我说：“是呀，他说我是李增长，学校1962年，我便当兵去了，今年才从原兰州军区调回安康军分区。”十年不见，我们都变了，都长大了，此时相见，挺有缘分。张博林副司令员50多岁，听说我会打乒乓球，此后常常叫我去军分区玩乒乓。顺带招呼我吃顿好饭，吃细粮。张司令员是老八路，球打得好，人更和蔼，把我当娃娃，我们成了忘年交，老同学给他开车，跑路，关系更进一层。

下乡采访有时会碰到关庙的老乡。1973年夏天，报社派我和女同事赵振清去镇坪采访，任务是采访镇坪县大力发展中药材。我们俩都年轻，未婚，赵振清西安师范学院毕业来安康锻炼，分在安康日报社当记者。她是典型的关中西子，人高马大，口畅心直，很有文采，大城市的姑娘第一次到镇坪，既新奇，更多的是不适应。那时在镇坪，一条街，吸一根烟便从上街走到下街，两边的高山好像压在人头顶，令人喘不过气来。一到黄昏，街上便少有行人，昏暗的路灯下一群无名的虫子乱窜，赵振清此时的心情也是这样的。采写之余，她经常拉我上街转，有时热情的很，说实话，我不想随她上街转悠，人家大城市的人很开放，我们山沟沟的比较封建。那时镇坪县招待所吃的是“面面”饭，即用玉米糝蒸成干饭，全是散的，很难下咽，我们都是吃一口面面饭，喝一口水，冲下去。我们的工作很顺利，采写任务不到一周便完成了。赵振清说：“赶快回，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可是越急越有事，那天上午坐班车回安康，车还没到曾家坝公社，便遇见大塌方，无法通行。所有旅客必须在曾家坝旅馆住一夜，等待清理塌方。当时我还去报社同事任玉荣挑了一副木桶，一群人争先恐后奔向旅店。几公里路下来，我和赵振清在最后一间房，等我们去登记住宿，店说：“只有一间了，你们两小口刚好。”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们不是两口子，我们是同事。”赵振清在边上傻笑。最后赵振清住那唯一一间房子，晚上我住在登记室，将就一夜。回到单位后，大家都知道镇坪之行我们被误解，一时成为笑谈，赵振清后来调回西安，嫁给著名导演吴天民的弟弟为妻，不久前听人传说，赵振清同志去世了，真是惋惜，好人哪，大城市的姑娘在安康受苦了。

宣传报道常常是为他人作嫁衣，有不少人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改变了人生轨迹。1976年夏天，安康地委在汉阴县召开全区四级书记大会，我从地区五七干校抽调上会采访报道，因为到会的陕县比较迟，只能住在县城对面汽车站的旅馆里。我住店时，房里只有一位客人，在聊天时，知道他叫王天祥，安康人，1963年安康高中毕业后到汉阴县两河口钢铁公社插队当农民，后来在大队当会计，再后来成了钢铁公社信用的信贷员，下乡13年，今年32岁了，仍然单身，生活清苦。我对王天祥13年走过的路，特别是在秦岭的深山老林里如何生活和工作的，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聊了半夜，第二天他留下来，又聊了半天，事情果然不错，特别是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努力劳动，为社员服务，在劳动、生活中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遭遇过九死一生的险情。钢铁公社地处秦岭南麓，11月大雪封山，一次他外出工作，遭到黑熊的突袭，他和黑熊同时滚下山沟，他被大树卡住了，而黑熊则跌落谷底，他才得以逃生。第二天下午他返回钢铁公社，我向领导汇报了此事迹，并要求陪他一块去钢铁公社实地采访。我俩坐上西安的班车，越过平河梁，在旬阳坝下车之后搭林业局的去钢铁公社，不料途中公路塌方，我俩又返回旬阳坝公社住下，继续聊天采访，最后形成了长篇通讯《火红的十三年》，在陕西日报、安康日报头版刊登，引起轰动，王天祥一下出了名。很快，宁陕县农业银行将其转正，并调回行里工作。安康地区农业银行不甘落后，很快办理调动手续，王天祥不久便找到了心上人，多年以后当上了农行的领导。王天祥是一个憨厚木讷的人，言语很少，一说脸红，他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你创造了我。”



妙手浇开幸福花

王永琴

山口沿石牛河北岸山边环绕全队住家户，灌溉北岸所有土地。一条从南岸的另一条小河沟里引水环绕山坡下的大片土地。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条渠，队里的许多旱地都变成了水田，所以我们大队从来不缺口粮，不缺吃穿，人畜兴旺，农家肥充足，庄稼长势喜人，连年丰收。不仅没有吃过国家返销粮、救济粮，而且每年都按时按季给国家上缴公粮。

有一年春节，大队文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保管库的大门上，上联为：一河两岸两条渠不靠天。下联为：妙手浇开幸福花吃饱饭。横批：人勤春来早。

是啊！若非那一双双妙手，又何必幸福什么啊？

1970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投身到三线建设中，在襄渝线一干就是两年。1972年回家后，父亲被安排到蜡烛山林场当场长。尽管那是只有3个人的林场，条件艰苦，人手紧缺，可他除了巡山护林外，还栽种了大量的杉树。

在村民强烈邀请和家人的坚决反对下，父亲说：“我啥都不图，只图让大家越过越好！”他主动请求上级领导放他回来继续当大队书记。他先是从邻省某地请来师傅，建砖瓦场，让年轻人跟师傅学习脱坯、做瓦、烧窑等技术。头一窑砖瓦就烧成功了，此后全公社的社员都来我们队买砖瓦。

我大哥又牵线搭桥，为队里争取到了种植中药材的机会。父亲就带领社员在荒无人烟的大山腹地建药场，种植黄连、党参、当归之类的中药材。还在荒坡种甜杆，用来烤酒，销售给附近村民。早年间开荒种下的漆树、桐树都开始收活了，不仅支援了国家建设，还为队里创了收。

队里的经济发展壮大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队里又在北岸那条渠的中游修建了一座小型发电

站，成了全公社第一个使用电灯照明的大队。接着又购买了打米机、磨面机、拖拉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一直在为大集体奔波操劳，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学习，读报纸。

父亲上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工整字，左邻右舍写个书信啥的，都要让他代劳。对我们这些儿女，他总是不苟言笑，威严到几乎不近人情。甚至让我们不敢接近，不敢跟他说话。在我们眼里，他是生产队的人，只属于大集体，不属于我们这个家庭。

更可气的是，为了替全公社完成上缴国家统购生猪的任务，父亲把别的生产队完成不了的任务揽过来。母亲每年至少要喂6头猪，2头缴统购猪任务，2头供一年吃喝，留下2头接槽。母亲勤劳善良，贤惠好客，而且做得一手好茶饭，队里不论谁家过红白喜事，她都去帮忙。母亲不仅要操持一家人吃喝拉撒，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为了让那些生猪长得膘肥肉厚，母亲每天都得漫山遍野打猪草，她的脊梁骨总是磨得青一块，紫一块，年复一年就落下了腰疼疼的顽疾。而那2头供我们一年吃喝的猪几乎都招待了那些跟我们非亲非故的头头领导，开始有些人吃完饭还会掏几毛钱或是几两粮票出来，母亲从来不收人家一分一厘。住往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有站一边望嘴，干瞪眼。

我们多想和父亲好好说道说道，可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常常只有吃饭的时候能见到他，而且还得是没有客人的时候，他才属于我们这个家，也只有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上桌。可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免不了要给我们说一通修身守正的道理，他则以身作则影响和教育我们。让我们看在眼里，铭记在心里。尽管在我们心中，他

既不是个好父亲，也不是个好丈夫；尽管我们心生怨愤，背地里总是埋怨他活该，但我们还是在内心里听他的话，在行动上默默地遵守着他的教诲。

父亲的严厉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做人，父亲的勤劳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生存，父亲的大公无私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做一个人正派人。

七八岁时，我们就知道替母亲分担家务，每天放学后就去砍柴、打猪草。早上起来先扫地，挑水。后来工作总是兢兢业业和为人处事，生活总是与人向善。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也有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才体会到父亲为集体干一番事业的苦心，他的大公无私更是让我们敬佩。时至今日，那些打米机，磨面机，拖拉机早已成了废铁，成为了历史。强胜大队早已改名叫兴隆村，村里没有一户贫困人口。人们早已用上了电网，家家户户户不仅有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还用上了燃气灶，过上了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我的父亲却渐渐老去，唯一能让他自豪，给他慰藉的只剩下他们那辈人修的水渠了。渠水依旧日夜不停地流淌着，灌溉着农田，滋润着的一方人。

父亲常常拄着锄头，走在那两条水渠上，查漏补缺，修缮堵洞。有时候，他会在渠边一坐老半天。没有人懂得他坐那想什么，抑或是倾诉什么……村里人只觉得他有些怪，甚至有些人怜悯！可我们明白，那哗哗流淌的渠水，是他的青春，是他的挚爱，是他的生命之源！

父亲过世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送他。说起父亲曾经为村里所做的一切，大家感叹之余，更多的还是感念。

每次回去给父亲上坟，跪在他的坟前，跟他说村里的变化，告诉他，谁家又添了小孩儿，谁谁又盖了新楼房，谁家又添了小轿车……尤其要跟他说的是，国家拨了专款，把这座山脚下环绕村庄的那条水渠加固修成了水泥渠道。他不用操心查漏堵洞了……

父亲，你可曾听见？



那山 那城 那片雾

王腊梅



同季节再次去到紫阳的时候，一样的天气，却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大山上层层笼罩着细细的薄雾，如烟如云，似人间仙境般召唤着我。我还是会感慨，这样的景色是这个季节总是会馈赠，它是那么的梦幻且充满着无限的魔力。

与同伴站在院子中央，因为不寒而栗而同时抱紧臂膀。又几乎同一时间抬头仰望。“你看，那山腰上缠绕的那一层最薄的雾气，像不像一缕白纱，给这深深浅浅的绿色披上如此清秀的外衣。”是，你看，尤其是左边的那团，真美呀！”身旁自顾自干活的阿姨，听见我们的对话，好奇地张着嘴巴，顺着我们的目光看过去，貌似失望的神情拉下眼睛，低下头自顾自地干活了。

我和她离得很近，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可我还是清晰地听见了。“这不就是山上的雾吗？天天都这样，这有啥美的？”“阿姨，这么好的雾，不美吗？你看，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还有山顶上的，你看，多好看呀。”我一下子就焦急起来，拉着阿姨的袖子，自顾自地用手指向那片薄雾，自我陶醉并反驳着她。“阿姨，你快看过去，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那山，我发现她眼神毫无焦点，而她也未再搭腔，拿起手边的扫把扫开了。我明显地感到她的不屑一顾，隐约中还带着深深的不解。

我是仔细看过冬天的雾，多数学时候像是大片乌云盖下来，思想里总是向往阳光能将它穿透，带来一丝明媚；也平静地欣赏过夏天的晨雾，为了看雾专程早起，可无论你再早，它也都不过是转瞬即逝，任凭你怎么留它也不留住。

今天这景儿，不似冬冬那么浓厚，也不像夏天般的透亮，就那样安静的，稳稳地，不消不散，不拒迎，不克不范，不疾不徐，不明也不暗，不长也不短，如此从容且自然。对面层峦起伏的建筑群与汉江相得益彰，车子飞快地驶过，我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小香港”，城里的人操着一口川味儿紫阳话，热情洋溢，热情迎客，真挚的眼神以及真诚的心，所到之处，心安自在。

朋友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小馆热情招待，小馆名为多味坊，馆子不大，有个小院，院子东边的大树下小桥流水不断，还长满了开得正旺的粉色小花。我是喜欢吃豆类食品，没想到这里的特色就是以豆类食品做食材来的。由豆类衍生出来的豆腐、豆浆、豆渣等等，做出各色菜肴，平日常常用来寻常普通的萝卜、白菜，也都能吃出紫阳这方水土中特有味道。

意味未尽的返程，有些累了，沿途本无心观景，可却生生地被这一路上的所见触动，略显疲惫的我此行不枉。